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三年第二辑（总第四十三辑）

工商经济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三年第二辑

(总第四十三辑)

工商经济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3B01/16

湖北文史资料

(半年刊 1980 年创刊)

1993 年第 2 辑总第 43 辑 1994 年 5 月出版

编辑：《湖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出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长江船舶设计院印刷厂
发行：《湖北文史资料》发行部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
字数：166 千字 印数：3000 册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3285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67/K 定价：4.20 元

目 录

工商界著名爱国人士周苍柏	范宇豪(1)
记先父华煜卿的几件事	华楚珩(7)
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李国伟	范宇豪(15)
缅怀先父苏汰余	苏先勤 苏先劬(18)
我省精明干练的工商界著名人物赵厚甫	范宇豪(29)
爱国民主人士厉无咎先生 ——记荣氏在汉企业最后一任经理	唐庸章(34)
我们所了解的黄师让	范宇豪 徐忠茂(45)
湖北省工商联的创始人之一——郑南宣	范宇豪(49)
记我国最早的水泥工业奠基人之一——程祖福	王文宣(53)
航业名宿王寿臣	郑忠银(60)
膏盐矿业科技先驱陈荫三	陈战生(66)

回族爱国人士答容川

——记由棉花商业转制药工业的历程

- 朱复再(75)
- 忆王成之的几件事 鲍殿丞(82)

吴复茂南货店 吴瑞麟(87)

马裕泰杂货店 马呈章(96)

何乾泰药店 何敬德(102)

孝感刘祥盛之兴衰 张树森(107)

协昌商店的兴衰 杨荣昌(114)

生意鼎盛 经久不衰

——记吴立生商店解放前的经营管理

- 浠水县工商联(118)
- 抗日战争时期的济济铸铁厂 刘光宇(121)
- 蒲圻羊楼洞义兴茶砖厂 雷启汉(124)
- 马应龙眼药的传人——马惠民 朱忠惠(129)
- 工商界开明老板——刘振家

..... 汉川县政协文史办(134)

我在 40 年代的经商生涯 卓伯修(139)

旧沙洋镇工商经济情况的回忆 冯锦卿(144)

云梦义堂镇旧粮行情况 杨传烈 倪虹丹(155)

回忆 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	
民族工商业的影响	徐雪轩(159)
维护国家内河航行权之争	黄绍洲(162)
仓汉轮船局的创办、发展与消亡	曾子信(166)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在襄樊	
竞争始末	龚焕章(175)
武汉私营轮船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后	杨子名(179)
武汉第二制药厂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四十年	
.....	朱复再(184)
武汉印染厂公私合营以来的三十年	平麟伯(190)
湖北省解放前商会组织概况	王廷良 王卫东(197)
别具风味的孝感麻糖	朱幼勤(204)
东坡饼	(206)
宜红茶与宜都茶厂	杨诗发(207)

工商界著名爱国人士周苍柏

范宇豪

周苍柏老人(以下均简称苍老),湖北武昌人,生于1888年,卒于1970年。祖辈在武昌大堤口开设周天顺炉房,祖父周庆春时迁至汉阳双街弹夹巷继续经营炉房,改名为周恒顺,以后逐渐改营机器制造业,改招牌为周恒顺机器制造厂。不久,祖父去世。分家后,由其叔父周仲宣继续在汉阳经营周恒顺厂,周恒顺厂实为武汉机器制造业的第一家。苍老父亲周韵宣在汉口龙王庙河街开设鼎孚行经营五洋货品,后来又合资创办广茂煤炭公司,经销山西白煤,曾担任商办汉阳电气公司董事长,为当时武汉商界知名人士。

苍老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书院,后转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纽约大学攻读银行系,获商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在沪汉等地从事商业工作,曾受雇于人,也曾自开商行。以后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邀请苍老在行员训练班任教,继而任汉口分行副行长,便开始选行址、建大楼,筹集存款,开展业务。由于苍老的积极经营,业务因而蒸蒸日上,至1926年升任为行长(经理)。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汉,苍老出于爱国热忱,积极支持。当时,由于武汉国民政府发行国库券,银行发生挤兑风,唯独上海银行在苍老主持下,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对大革命前的存款一律按现洋兑付,因而不仅没有受到挤兑的影响,反而存款陡增,业务

• 1 •

更旺。以后，他又举办仓库、保险、信托、外贸等服务项目，积极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致使上海银行成为汉口重要银行之一。这时他还伙同友人设立义记行，经销颐中烟草公司产品。鉴于当时不少市民沉溺于鸦片烟、赌博，社会风气腐败，苍老为了挽转颓风，使武汉市民能有一个正当的游览娱乐场所，就在武昌东湖购置土地，创设“海光农圃”，既从事农业改进和果树栽培，又设立游泳池，也兼及养鱼、饲马，为广大市民提供锻炼身体，开展正常娱乐活动的场地。在经营兴建海光农圃时，苍老每逢节假日率领子女亲自辟草莱，除荆棘，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使东湖逐步成为旅游胜地。解放以后，邓子恢（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陶铸（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张执一（中南局统战部部长）等同志到东湖苍老家探望，一同在湖边眺望，几位领导同志对湖光山色赞美不已，苍老欣然对他们说：“我想把海光农圃全部无偿献给国家，不知你们几位以为如何？”几位领导同志当即满口称赞。从此，“海光农圃”即由武汉市政府设立东湖管理处，扩大场地，逐步扩大为现在的东湖风景区。苍老当时仅保留在梅岭的一栋小屋和屋前一块草地。对这块草地，苍老倍加珍爱。在五十年代，每当晴日，清晨傍晚，苍老都在坪中漫步，或饮茶小憩。到1957年，由于东湖扩建需要，苍老又欣然让出，迁至武昌胭脂路寒山宫居住。

抗战开始，苍老的次子周德佑，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回汉参加党所支持的湖北应城县汤池游击训练班学习。这个游击训练班是李范一先生（抗战期间曾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煤炭工业部副部长）主办的，训练班主任是陶铸同志。苍老为支持训练班的开办，捐助三千银元。德佑在训练班毕业后即参加拓荒剧团即后来的抗日演出七队，当时任队长的是原农业部部长何康同志。德佑的行动受到苍老和苍老夫人董燕梁的支持。当时，陶铸同志曾多次到苍老家中和上海银

行,陶铸同志曾对苍老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进了城,第一面红旗就插在上海银行的楼顶上。”德佑积极工作,因积劳成疾而不幸病故,时年仅十九岁。病故后在汉口举行追悼会,周恩来同志(国共第二次合作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邓颖超大姐都参加了这次追悼会并亲书横幅“模范青年”。新华日报还出了吊唁专刊。德佑的遗骸就葬在东湖梅岭一侧。苍老曾说过:“我的儿子德佑,那么年轻,又正在求学时期,家庭经济条件又比较优裕,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呢?我当时没有学过马列主义,对党还不大了解,我想我儿子为什么那样执着追求进步、以至参加共产党,这总是有道理的,我是出于爱子之心支持革命的。”有一次,演出七队赵寻等十三位同志在山西被阎锡山拘捕入狱,其中一人交保治病,便连夜出来找苍老设法营救;苍老当时在恩施任湖北省银行行长,便去求财政厅长转请省主席陈诚设法,财政厅长问苍老:“这些青年有没有问题”,苍老断然回答:“我用脑袋担保,他们不是共产党,都是和我儿子一样的爱国青年。”陈诚发了电报,再加上其他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终于获得释放。苍老夫人董燕梁对苍老的这些行动也是支持的。她在抗战期间,曾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做了许多救护伤员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南妇联的部长、湖北省妇联副主任,到北京后任国务院参事。在50年代,湖北省工商联每次召开妇女会议时,董燕梁都代表省妇联到会讲话;1956年全国工商联召开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她是湖北代表团的团长,又是大会主席团的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苍老在重庆担任中美合资的复兴公司协理,自己还办了一个化工厂和皮革厂,苍老办皮革厂的目的,是想使重庆的人民都能穿上便宜的皮鞋。这时,他还在江北建了一个两层楼房作为住宅,实际上这成了党的地下工作据点。这时有不少爱国流亡青年(大部分是地下党员)经常往来于“周公馆”,有的一住半年,苍老和夫人董燕梁对他们爱如子女,不仅管吃而且管穿、用,临走时

还给足旅费。苍老在重庆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都经常到“周公馆”来，这时，发生了震动山城的戏剧家洪深自杀事件，苍老于是向作家、诗人张光年（即光未然）提出要进行资助，张向周总理请示，总理答复可以，张就拿了苍老的支票给了洪深。尔后，党安排张光年到缅甸，苍老又给张光年挂了一个实业公司副经理，并安排张乘坐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卡车以保证安全并给足旅费，当张在途中翻车受伤住贵阳医院治疗时，苍老又汇给路费。

抗日战争时期，苍老还在恩施担任过湖北省银行行长兼省政府平价物品供应处处长，深得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的信任。抗战胜利后苍老担任湖北省善后救济分署署长，杨显东同志为副署长，这时新四军五师在宣化店，第一次由苍老同意由杨显东同志亲自把面粉两千袋送到宣化店，以后还陆续运送不少物资；此事震动了善后救济总署，向苍老提出质问，苍老以“救济署的宗旨是哪里人民有困难就往哪里救济”，把它顶回去了。王震同志曾带一袋黄金找到杨显东同志，杨就把它交给苍老，董燕梁大姐便找来一个银行亲信沈宋清协助存入银行，作为接济地下党的经费；这笔钱没有用完，苍老又把剩下的一小袋交给当时任湖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郑绍文同志。

解放前夕，陈诚还要苍老去东北，苍老谢绝了，住在上海等待解放。建国以后，苍老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轻工业部副部长，1951年即兼任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1955年以后改任副主任委员），以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苍老在担任湖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期间，是经常来会办公的。在这八九年期间，苍老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作了不少贡献的。苍老很重视轻工业的发展，有一次，苍老拿了从美国寄来的一份有关纺织工业的设置意见，交代送交有关部门，他说：“轻工业能较快积累资金，使重工业能有效发展，

所以对轻工业绝不能忽视。”苍老对工作认真负责的，记得 1953 年，省工商联召开执行委员会，历时十余天，苍老于时已是高龄，且患高血压，不仅自始至终参加，并主持会议，还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湖北省在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省银行和有关单位不是请苍老写稿就是请苍老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作广播讲话，向全省工商界进行动员，他拿着讲稿，经过反复斟酌，按约定时间试讲几次，做到准确无误。苍老又极其谦虚，对代他起草的稿件有不同看法时，还与起草人反复研讨，总认为自己因年老不能经常深入实际调查，深恐自己的意见不符合实际。对机关同志们的意见，苍老虚心听取，苍老经常说：“我要尊重你们的劳动”，情真意切，很能感人。

在 1953 年全国工商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党公布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苍老为湖北代表团团长，苍老学了文件，听了报告，衷心拥护这条总路线，欣喜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真有希望了。”1954 年全国工商联召开会议，陈云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调整工商业的报告，苍老带回文件，在省工商联召集的会议上认真作了传达；在传达后，苍老很高兴地说：“陈云副总理真正替工商界说了话呀，真是专家，说得入理。”

1956 年前后，毛主席有一次到武汉，接见了几位党外高级民主人士，还一起进餐。第二天苍老谈到会见经过，喜溢眉宇。1958 年全国工商联在上海召开会议，1959 年全国工商联又召开代表大会。1960 年全国工商联又在西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从这些会议活动和多年的社会实践中，苍老坚定一个信念，就是听、跟、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苍老曾留学美国，对美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他曾多次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赶上美国那样的物质文明，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东方文明，我们的国家就会真正富起来。”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1970 年苍老在北京患病住院，当时正值“史无前例”时刻，李先念同志并代表周恩来总理前去探望。苍老逝世后由周总理亲自

安排人料理后事。

（作者曾任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省工商联秘书长）

记先父华煜卿的几件事

华楚珩

先父华煜卿(1909—1985),解放前曾长期在申新第四纺织公司和福新第五面粉公司(简称申四福五)的汉口分厂工作,由学徒而成为现代纺织、面粉工业的管理行家。解放前夕,参加了民主建国会 and 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共武汉地下市委领导的革命斗争。

解放后,他曾任武汉市民建主委,市工商联副主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委、主委,民建湖北省委会主委,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湖北省政协党组成员,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本文系就他晚年卧病中,同我们子女谈及的情况和不少前辈、亲友和民建老同志的著文或谈话中涉及的情况,简述先父数事。为简略文字,文中涉及的长者仅书姓名,请能原谅。

—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内迁,其后战火西燃,迁驻武汉的国民政府又将西迁重庆,并在1937年末命令武汉较大的民族工业遣散职工,向后方迁移。中国工业落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为中国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大后方民

用所必需，又是支持抗战军用的重要物质力量。工厂内迁，意义重大。

武汉工厂内迁，存在交通紧张、费用巨大的困难，以及途中被炸的危险。申四、福五有的股东，对两公司的汉口分厂西迁颇为犹豫。先父当时是申四汉口分厂的一个28岁的统计员，出于民族感情和工作依托，不以人微而废言。特撰写专文，以个人署名投登于当时迁汉的《大公报》，力主内迁。其文章引人瞩目。当时，汉口两分厂的主持人李国伟也力主内迁，便于1938年6月决定将汉口两厂分迁重庆和宝鸡。

这时，申四福五的汉口厂共有职工3千多人，5万多纱锭，近9百台织布机和漂染厂的全套设备，以及日产1万3千多包的制粉机和动力设备等，内迁任务艰巨。厂方多方借贷，给若干个月工资和旅费遣散职工，另指定这一些职工及其家属随轮或火车押运机件分迁渝宝。

内迁漫道，充满艰险。迁川的首批纱机，布机和发电机，未到宜昌，就遇风浪沉没。厂方先是派蒋叔澄、孙荫庭在宜昌设第一中转站，因任务繁重，宜昌又处于日机频繁轰炸之下，转运安全极为严峻，厂方再自渝调先父前往加强工作。后入冬水枯，小轮至万县即不能上驶，厂方又派龚培卿在万县设第二中转站，以木船转运机件赴渝。先父深知，转运能否安全而又迅速的完成，对抗战的军需民用至关重要，更关系到两厂迁川后的存亡，以及职工和家属的活命问题，且自己正值壮年，应多为此献力，以显劳绩立足于申四。面对眼前的险滩恶浪和艰巨任务，他拼力以赴。

先父及中转站的人员为解决转运的安全问题，在机件等由汉到宜后，即在宜昌对岸江边五隆山的山沟里觅得空地，彻夜用小木船将装机件的大木箱运往隐蔽起来。白天日机空袭，难于发现，即使发现也怕碰撞山峰而不敢轰炸扫射。先父等到白天趁机小睡，夜间再披风霜雨露，下临湍急江流，与工人们一道，通宵守护机件，上

下转载。为了加速转运,渝厂负责人厉无咎在渝雇用了在川江最低水位时仍能上下畅行的特大木船,由渝直放宜昌,促使宜昌中转站以更大的工作量,较多较快地转运机件直航重庆。经过 36 只大木船多批上下直航,宜昌的转运工作才历尽艰险,于 1939 年胜利完成。

申四、福五重庆分厂的职工们,经过半年边建厂、边转运、随到随装的紧张劳动,1939 年元月申四重庆分厂就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纱厂,开工生产;福五的重点面粉厂也于 5 月开工生产,比由汉同时迁渝的同类工厂早了一年多生产。

申四福五两公司的迁宝鸡的分厂,虽曾遭轰炸,但也于 1941 年前后建成投产。成为又一个配套的全面型纱、粉企业。此后,两公司就以渝宝两分厂作为基地和母厂发展扩建子厂。抗战八年中,申四福五在川陕甘各省建成十多个多种工矿的子厂,成为大后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支持抗战中的军需民用,为西北现代工业的开创和奠基,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各路大军迅速南进,反动统治已趋土崩瓦解。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武汉解放,也已在望。

此时,驻在武汉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假装“促进和平”,坚守武汉;实际要拆迁工厂、破坏城市、准备南逃。又藉口备战,以“戡乱捐”、“城防捐”、“粮秣捐”等搜刮民财;竭力镇压革命人民。但是,中共武汉地下市委领导全体党员和革命群众,针锋相对进行反对和平阴谋、反破坏、反拆迁、保卫城市、团结应变、迎接解放的斗争。

这时,先父是申四、福五两公司总管理处总务组副组长,兼福五汉口分厂的副厂长,该处主任李国伟是汉口市工业会理事长,先

父为该会理事兼秘书主任。在主持日常工作中,与三十多岁的近龄人、理事余金堂、施之铨、专业秘书吴传启等相识。

先父少孤,家贫失学。1927年大革命中,他为革命形势所鼓舞,以练习生积极参加申四汉口分厂的工会活动,并任工会中共支部文书,与厂里的中共党员和工会骨干接触较多,其中有些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惨遭杀害,他也被开除失业。后在武昌一纱厂任统计员,又以该厂关闭而失业。两度失业磨难之后,才重返申四汉口分厂任统计员。此后近二十年间,他努力工作,通过讲求实效的生产实践逐步成为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但向往进步,勤奋自学,以古典诗词抒发他愤世失意之情,并在深入社会中进一步认识到反动统治的腐朽和必然崩溃。

余金堂和吴传启当时是地下党员,施之铨是地下民建会员,先父与他们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相谈甚得。1948年底某晚,吴到我家告知先父,说现在党要我们做一件工作,即通过市工业会调查武汉工业设施、原料储存、资本家动态等资料,问先父愿不愿意做。先父知道这是党的信任和召唤,也正是自己从大革命失败以来向往的,他立即同意了。次晚,吴又陪同地下市委统战工作组的宋洛到家里见面,商谈工作。

在连续三个月秘密、紧张、多渠道地进行调查中,先父经常研究整理材料到深夜。写好后,亲交吴传启和宋洛。当时地下市委是根据上级指示,为保护城市和准备解放时搞好接管,大力进行各条战线调查研究工作的,各条战线的大量调查研究材料,经过地下市委整理后秘密地辗转送到北京。

1949年2月某日,武汉建国工业社主任金斌统来我家,面交了施之铨从上海给先父、厉无咎、贺尔梅、蓝昌农的密信,敦促四人参加民主建国会,成立组织,开展工作,迎接解放。先父立即同意,约贺、蓝次日到家里传阅该信(厉在沪治病),由金传达了上海民建总会地下领导人胡厥文的指示。三人一致同意,并填表入会,组成

了四人的民建地下小组,推先父为组长;决定了如何开展工作。由于胡指示的任务,与中共地下市委当时领导开展的斗争任务完全一致,小组就在地下市委领导下,为贯彻上述要求,特别是为反拆迁、反破坏而斗争。

这时,先父已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吴传启作介绍,得到批准,由赵忍安与他联系。这时武汉已临近解放,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先父急流勇进,在六个方面努力进行工作。

在民建小组方面。他组织会员投入有关工作,在我家地下室刻印了《迎接大时代的到来》的传单,向全市工商界中上层人士寄发,阐明解放的必然趋势,希望“不要逃跑,不要迁厂迁店,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维护好工厂商店的正常生产和经营等等。

在申四福五方面。李国伟4月初离汉去香港时,任命厉无咎和先父为申四福五汉口两分厂的正副经理。厉因病去沪就医,先父则负责两厂一千多人生产和生活。他与厂长张之光等组织了护厂委员会,依靠职工组织厂内联防;充分准备原料、燃料和食品;以3千银元为“酬劳”,消除了一个炮队要在厂房上架炮的破坏威胁;还参加了水厂、胜新、申四、福五等相邻四厂的护厂联防。在解放前夜,四厂以2千银元遣走了敌军工兵排拉来的炸药包,保住了各厂的生产设备和职工生命财产的安全。使申四、福五的分厂在解放前后,始终坚持了正常生产。

在市工业会方面。“华中剿总”要将各大纱厂拆迁广西,并指定市工业会订计划。先父借口拖延时间,后又提出多方面的情况都来不及实现,使拆迁遂成泡影。“剿总”为搜刮民财,又发行“珠宝奖券”和“房地产奖券”要工商界摊派,先父串连市商会共同抵制。“剿总”来人将奖券强交工业会,并抢取图章自盖收据,扬言不摊派就按为共产党办事治罪,先父嘱干事姜岱东送还。“剿总”又派爪牙携来,并欲捕人。姜机智走脱,先父仍拖不摊派,“奖券”遂堆在工业会直至解放成为废纸。